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这个问号,应该拉直了才对——近日之间,早已风靡南北的“艳模”干露露发出微博,说她要考公务员啦,岂但是“从政”,还要“争取当市长”呢!干露露一脱成名、以脱为业,现在也要走“仕途”,当“市长”?于是舆论之间,不免惊诧,也不少疑问。

其实干露露的要“当市长”,原是不必惊诧的——“脱星”的“从政”,不是一个“国际惯例”,甚至差点要成为“普世价值”吗?当红的艳星,进了内阁,当了部长;闻名的脱星,登坛众院,做了议员,在于欧洲大陆,在于大洋彼岸,不是早已有了先例么?所以一个艳模,如果能当“市长”,大概也是西风之东渐,也是对于五千年文明的一大“启蒙”吧。

再说干露露如果竞选“市长”,恐怕票数还会不少呢!今日之干露露,加上她同样一脱的“干妈”和“干妹”,因为行如其名,所以所到之处,追随者蜂拥,不论是车展之上,还是典礼仪式,莫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对于干露露的“出位”,舆论之间,早已批斥再三,但是干露露越批越红,据说签

约的门槛已被踏破,档期排也排不过来。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气太旺”,看的人实在太多,从成功男士,到初出的俊男,几乎要被一网打尽。所以干露露如果竞选,登高一呼,当众再脱,那选票或许直线飙升呢!

干露露也要当“市长”?

司马心

还有一条,那便是干露露一旦“从政”,她的“公共形象”或许也不成问题——你看今日之干露露,一边饱受公众诟病,一边却占尽了报网荧屏的“娱乐版”,成为广而告之的艳照。干露露出场之时,闪光灯闪到众人睁不开眼,那里头一半来自媒体,干露露一路之脱,也有大批记者尾随而去,为的是“不要漏掉一点新闻”,再加上我们的媒体,素来推崇“娱乐至死”,即使是时政新闻,聚焦的也不外乎“美女总理”、“绝色议员”,一旦干露露果真当上了市长,那还不是最典型的头条新闻?我们的“新闻意识”一定不会淡薄,我们的“专业主义”一定会长袖劲舞的哦!

干露露要当“市长”,也有人说

应当容忍的,甚至提高到“打破阶层固化”的惊人高度,说我们的社会多元宽容,人人都有机会,十年前湖北的“三陪小姐”都当上了副局长,一个干露露为什么不能当“市长”?当然也有人想起了十年前德国的一桩公案——新任卫生部长

的乌拉·施密特女士,因为年轻时“打理”过一个叫做“芭芭丽娜”的“最受欢迎色情娱乐场所”,且曾亲自客串“下海”,结果任命一宣布,德国主要媒体、大小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做出醒目大标题,曰其“红灯区区长”?连篇累牍指出“三陪旧事”,大有把部长大姐轰下来的势头……看来“国际惯例”也有“观念问题”,“思想解放”的德国人也许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平头百姓,那么“三陪”也好,一脱成名也罢,可以网开一面,但如你要做部长、当“市长”,从政登仕,那就不行,就要轰你下去。因为公众对于“市长”,有道德上的要求,恐怕不能让你一“脱”之后,再“前程无限”呵!

干露露要当“市长”,当了“市长”后还要“关注环保、民生和反腐败”等等,不管是的再次炒作,还是她的胡言乱语,恐怕都不要仅仅当成一个笑话。

初夏,刚割完麦子的中原大地泛着金光,田野上群鸟跳跃、飞翔,似乎在讴歌漫漫 5000 年华夏文明史。名扬世界的安阳殷墟,就在这先民的图腾——欢愉的鸟鸣声中,呈现在我的眼前。

今年是殷墟发掘 85 周年,殷墟是我国商朝后半期文化遗址,大致以河南安阳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分散在村北洹河两岸的一些地方;东起自后岗,西至北辛庄,南起自铁路苗圃,北至西北岗,总面积约有 42 平方公里。这儿是第 20 个商王盘庚迁都的产物,盘庚迁殷 273 年后,商纣王在朝歌酒池肉林,残害奴隶,终于被周武王的金戈铁马一举摧毁。商灭亡后,其都城逐渐荒芜,在历史的风雨中变成废墟,埋入地下。1899 年,小屯村的农民在耕种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甲骨,遂被金石学家王懿荣

首次认识为殷商文字,后经王定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发展,揭开了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帷幕。然而,要揭示殷商都城真面目,必须对殷墟作考古发掘。1928 年春,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名导(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齐名的中国考古事业开拓者李济正值英姿

出了许多宝贵的结论。他认为商朝的陶器,就制造方面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灰色的陶器,包括煮饭用的鬲,盛菜用的豆,以及盛东西用的坛子和罐子,属于较普通的。二是白颜色的陶器,即考古学家称之为白陶的。这些白陶大部分祭祀用的,原料与现在一样。三是上过釉的陶器,这是世界上陶器最早用釉的例子。当李济宣布这一发现后,英国的考古学家立即在皇家亚细亚学会的杂志上,将这一特大新闻登了出来。

李济还将大批殷墟出土石刻运回北平研究。他指出在安阳发掘之前,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总认为中国的石刻,最早不会比汉朝早多少;安阳石刻出土之后,世界艺术家才知道东方的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第二个 1000 年。这些石刻所用的原料都是安阳附近出产的。雕刻品中立体型的较多,所象征的动物如虎头猿身或龙的雕刻,也有老虎、鹰和水牛。其中也有一些人体雕刻,保存完整的只是若干小型的,大的均附着力于建筑上。李济研究殷墟石刻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商朝人所用的图案及其设计和安排,现在仍有若干保存分布在太平洋各处的民族中。李济对殷墟发掘的贡献,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一名考古学家,一生中对于一个古人类遗存,连续发掘 15 次,这是人类考古史上的奇迹。基于此,今日殷墟以其恢宏的画面吸引了天涯旅人,此乃李济之功!我徜徉遗址,环顾四周,但见萋萋芳草中巧妙地点缀着形态各异的殷商动物石雕,石雕怀抱中那高耸蓝天的司母戊大鼎、仿造商代茅屋的纪念宫、玻璃覆盖的奴隶墓穴、深入地下的甲骨、怪峻的妇好墓、森严的王陵,错落有致地沐浴在斜阳之中,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李济:发掘殷墟第一人

秦维宪

勃发的盛年,他怀着一颗从美国留学归来,矢志于人类考古研究的雄心,毅然挥师南下。李济和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主持殷墟的发掘,前后共 15 次,直至 1937 年抗战爆发,震动于国内外,也成了李济考古生涯的辉煌顶点。

李济和翁文灏、董作宾等学者在荒凉的田野中仔细发掘,当他们发现土层中大量的甲骨文时,高兴得欢呼雀跃,从而为当下可认的 5000 殷商文字打下了基础。他们还挖出了殷商时代的史料(青铜器、玉器、建筑遗迹、日用器具、艺术品、鸟兽的骨头等)。这些都是我国 3000 多年前历史的真实面目的记载,连孔子也无缘一睹它们神秘的容貌。李济对出土的陶器大



九峰三泖(中国画) 萧海春

沈宝发(又名沈一草)与贺友直曾经是同事,“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两人同编八二大队。贺友直曾写道:“沈宝发最伤,一进单位就卷入‘文革’,一进干校只弄锄头铁锹,根本没碰过绘画专业,虽身处广阔天地却无所作为。”全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无所作为”的人美社编审,已经退休了,他将数十年编辑生涯里留下的理论文字搜集在一起,再加上一些未曾有机会发表的“未刊稿”和述说自己家史乡情的文字,编成一本《望尘集》,自费出版,其原生态文字让人耳目一新。

出书原生态 顾云卿 出书原生态,突出了一个真字:道真言,播真情,留真相。沈一草入社初还画过 3 年连环画,但最终没有画出世,故转而干编辑一行。他拟一副对联以自况:“有份曾与众贤哲相伴,只成是个前辈晚辈同事,没能入得斯门;无缘难拜尊俊为师,不认有过先生学生名谊,偷着从年头学起。”这本《望尘集》,把许多对自己不利的生活描述和社会评价,都如实地记录在案,需要一点勇气。

在《夏天的早晨》一文里,他写自己挤公交,吃食堂,住垃圾窝,倒痰盂罐,侍奉有三十多年精神疾病史老母亲的真实底层生活状态,对那些局促的生活从不回避。在《我学毛笔字》中,他不顾颜面地留下诸多同行对他的贬黜和批评,如张森说他的字太俗,格调不高;胡问遂说他写字“尚不入门,笔力全无,功力不够”“楷书基础太差”;胡海超对他说:“你是勤于笔而懒于思。临帖临得不错,脱手(离开帖)写就不行了,好像离了帖就不能生活了。”这些话,常人在收入集子时,唯恐避之不及,毕竟青史留名,尽量隐恶扬善才是。但是他照样坦然收入,录以备考,以存信史。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但是他“偷着从年头学起”,至今也书画双栖,事业有成。身为编审,也算出版行业的高级职称了。

书应该是信史,后人正是通过它,来了解和传承了以往发生的事件。如一味自诩,文过饰非,迎合媚时,后人定无法获取历史真相,延脉之举也无从谈起。



应钱永刚教授的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艺术与科学的天籁之音——蒋英与钱学森事迹展览”暨音乐会。那天正是世界博物馆日。

钱学森有一位非凡的夫人——蒋英教授,两位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的音乐。前者是爱乐者,后者是声乐大师;一个善吹铜管乐器,一个擅长欧洲古典声乐。我对这样一对大师级的“音乐伉俪”,除了敬仰外,还有几分好奇。

除了历史照片资料,展厅里还陈设了一部分珍贵的文物原件,其中有蒋、钱共同演奏过的吉他、竹箫。还有钱学森在结婚时送给蒋英的礼物——一架斯坦威大三角钢琴。我从钱永刚教授那里,搞清楚了他们父亲钱学森生前吹奏的究竟是什么乐器。他说:以前说小号,其实是误传,准确地说“次中音号”,现已不知去向。后来从旧货店淘到一种类似的乐器放在那里。这种对历史的尊重,正是严谨科学的博物馆精神。展厅一角,一名学生正在那架钢琴上弹奏蒋、钱生前喜欢的乐曲之一“贝多芬的奏鸣曲第 110 号”。琴声袅袅,使人们沉浸在对斯人的缅怀和遐想之中。

蒋英出身名门,系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早年留学德国、瑞士,主修声乐,毕业后留校任教,1947 年回国后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首场个人演唱会,取得很大成功。同年与钱学森在上海和平饭店结婚,后赴美国。1955 年跟随钱学森,勇敢冲破美国当局的封锁回国,在中

琴瑟和鸣自苍穹

夏军

央实验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执教,呕心沥血,桃李满园。蒋英与钱学森的婚恋颇为传奇,钱学森求婚的直白、自信和简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其说他们是青梅竹马,不如说是爱国主义和音乐,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面是发出巨大轰鸣声的火箭导弹,长时间分别,奔波于大西北,却不能与妻子言说;一面是歌声婉转,余音绕梁,声名鹊起,却来不及与丈夫细诉衷肠。科学的灵感与艺术的灵感是相通的,许多大科学家,当他们的事业达到极致时,常常与音乐艺术结缘。钱学森说:“蒋英对

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

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常使我的思维习惯,不自觉地游走于逻辑与直觉之间。在对蒋、钱一生轨迹的思考中,我突然感到展览会弥漫着一种特别的和谐、温馨的气氛。和许多观众一样,看着钱学森、蒋英的合影,不禁惊讶:何来如此天造地设一双!在今天的动輒以“帅哥”、“美女”相称泛滥的年代,有谁能与钱、蒋两位的风貌相比?大气、深邃、美丽、大方、睿智融洽在一起,这种科学的美与艺术的美的理想结合,根源于他们对民族、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与忠诚。

音乐会上,交大(钱学森母校)交响乐团和市三女中(蒋英母校)室内乐团演奏了中外名曲。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时我不禁仰望苍穹,除了对先人的缅怀,还带几分惆怅。



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中央文史馆主持启动了一个大型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以下简称《通览》),每个省市自治区一卷,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我们上海文史馆责无旁贷地承担了《通览·上海卷》的编撰。任务下达,吴孟庆、沈祖棻两任馆长先后为组织撰稿队伍、拟定提纲目录、试写部分章节、全面撰稿修改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上海此前已有《上海通史》、《上海文化通史》两部精品力作问世,如何避免重复,写出新意,使我们面临了很大的困惑和挑战。编撰组同仁不畏艰辛,同心同德,耗费无数个日日夜夜,经过无数次增删改定,前后历时数年,几易其稿,最终总算不辱使命,较好地完成了《上海卷》的编撰任务。我个人作为文史馆馆员,忝列主编,也算是为文史馆做了一件大事。

在编撰过程中,《上海卷》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央馆的支持、鼓励和指导。记得试写稿完成后,中央馆副馆长陈鹤良和《通览》两位副主编陈祖武、程毅中专程来到上海,听取我们汇报,充分肯定了《上海卷》对中央馆的要求和意图理解到位,执行有力,写出了上海文化的特点和亮点。中央馆馆长、《通览》总主编袁行霈先生更是在每一个编撰环节,多次当面或通过电话给

了我们许多切实而中肯的意见。记得我们最初下编的提法是“上海文化:中国文化的重镇”,后改为“上海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袁先生就在电话中告诉我们:“现在的提法好,抓住了上海文化的特点和亮点,‘中国文化重镇’云云,既没有突出上海文化的特点,也不符合上海文化的实际。”他看过我们试写的

参编全国地域文化通览

孙逊

章节后,又在电话中及时给予了肯定:“‘古文化遗址’一部分写得不错,仔细梳理出了上海文化前后衔接、连成一线的特点,改变了人们以为古代上海便是座渔村,没有太多文化积淀的误解。”又盛赞“《平复帖》一节写得很好,既突出了亮点,又写得恰如其分”。

撰写完绪论,中央馆在北京召开编撰工作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卷绪论和工作进程。由于当时很多分卷在谈到本省文化特点时都用了诸如“多元包容”、“开放创新”之类的概括,袁行霈先生特地在大会上提出: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概括本省的特点,就等于没有特点。并具体肯定了上海卷的绪论,认为把上海文化定位为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先行者和引领者的提法,以及近代上海文化“趋时求新”、“中西交融”、“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的特点概括,就比较有上海的特色。

这次编撰中央馆提出了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统一的要求,特别是对学术性要求很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受到了学术规范的教育。此外,为了增强可读性,中央馆要求精选图片,图文并茂。为此,上海文史馆积极联络有关单位,广搜图片,好中挑优,尤其注意挑选那些罕见和首次发表者。例如卷首彩插中有一幅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和中国早期基督教信徒的女儿黄素娥的结婚照,新郎碧眼高鼻,身着长袍马褂,新娘穿改良旗袍百褶裙,手捧鲜花,中西合璧,可谓是我国早期涉外婚姻的典型代表。书中还有一幅黄金荣 1949 年以后在大世界门前扫地的黑白照,当年不可一世的流氓大亨沦落到这步田地,这张照片很有代表性。

文史馆不是养老院,馆员要发挥参政咨询的作用。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